

雙峰對峙——燕京大學宗教學院與金陵神學院之比較

徐以驊

復旦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
Christianity Research Cent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一般認為，基督新教在中國正式的神學教育始於 1866 年。¹此後一百多年產生的數十所新教神學院校，沒有一所比燕京大學宗教學院或金陵神學院聲譽更隆，影響全國。既為神學教育最高層次的神學研究院，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和金陵神學院在中國的新教神學教育界，曾居無可爭議的領導地位。兩所神學院並駕齊驅，各領風騷，在本世紀上半葉的數十年，掌攬中國新教高等神學教育發展的基本方向。

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和金陵神學院同為跨宗派或多宗派合辦之高等神學學府，自然有不少共同點。然而，前者為大學附屬的神學院，後者為獨立的神學院，在辦學方式乃至神學取向上，又有許多相異之處。比較

¹師當理：《中國基督教神學教育的發展》(C. Stanley Sm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otestant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China*) (上海：，1925)；另參拙著：《教會大學與神學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這兩所著名神學院的異同，對於考察獨立神學院與大學神學院之利弊及研究中國新教高等神學教育的歷史，均有一定意義。

一、

從組織形式上看，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和金陵神學院同為多宗派合辦之神學院，² 而且均從聖道學院發展而來，頗合中國新教神學院發展的一般軌跡。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前身，是成立於 1915 年的匯文大學神科，該神科是北京、天津、通州三地的若干聖經和神道學堂合併發展的結果，其核心是匯文大學神學館（亦稱神道學科正班）和華北協和道學院。匯文大學神學館脫胎自美以美會在北京設立的懷理書院和英國循道公會在天津所設之聖經學堂，兩校於 1912 年聯合；成立於 1905 年的華北協和道學院則由美國公理會設於通州的潞河書院發展而來，此兩院於 1915 年合併。1918 年匯文大學和華北協和大學合併，正式成立燕京大學，匯文大學神科亦隨之改稱燕京大學神科。該科是由公理會、倫敦會、美以美會、北長老會以及後來加入的中華聖公會華北教區組成的跨宗派聯合機構。³ 金陵神學院則於 1911 年正式成立，它是由 1895 年成立的美以美會聖道館、1909 年成立的基督會聖經學校和 1904 年成立的

² 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歷史可參劉萬芳：〈燕京大學神科〉，《生命》第 2 卷第 2 期（1921 年 9 月），頁 1～9；張仁濟：〈憶燕京宗教學院〉，《展望月刊》第 6 卷第 6 期（1963 年 6 月），頁 12～13；劉廷蔚：〈燕京大學宗教學院〉，收董鼎編：《學府紀聞——私立燕京大學》（台北：台灣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頁 48～52；趙紫宸：〈燕京大學的宗教學院〉，收《文史資料選輯》第 43 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64），頁 106～128；徐以驊：〈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盛衰〉，收氏著：《教會大學與中國神學教育》，頁 68～150。金陵神學院的歷史可參李漢鐸：〈金陵神學院開創四十年來之歷史〉，《金陵神學誌》第 26 卷第 1、2 期合刊（1950 年 11 月），頁 1～10；張永訓：〈南京金陵神學始末記〉，《中華基督教會年鑒》（1925 年），頁 163～165；畢范宇：《金陵神學院史（1911-1961）（暫定稿）》（Frank Wilson Price, *History of Nanking Theological Seminary: 1911 to 1961, A Tentative Draft*）（紐約：紐約金陵神學院創辦人部，1961）。

³ 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從 1915 年起曾有不同的中英文名稱，最初為匯文大學神學館（Theological Depart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1916 年改稱匯文神科大學（College of Theology），1918 年又改為 School of Theology。為表明其神學研究院的地位，翌年改中文名為燕京大學神科。1925 年，燕京大學神科才最後定名為燕京大學宗教學院（Yench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Religion）。見《燕京大學宗教學院 1925 至 1926 年簡章》（*Yenching University, the School of Religion Catalogue, 1925-1926*）（1925 年 4 月）。

長老會聖道書院合併組成的。先後參與合辦的公會，有北長老會、南長老會、美以美會、基督會、監理會，及中華基督教華東大會。⁴燕京和金陵兩神學院儘管為多宗派合辦，但初期均由長老會居首要地位。

合辦神學在中國相當發達，甚至超過宣教會派遣國，被認為是中國新教神學教育的一大特點。據統計，1935年在華十四所招收高中畢業以上程度學生的神學院中，屬於各宗派單獨辦理的共有六所（信義神學院、中央神學院、聖約翰大學神學院、奉天神學院、北平匯文神學院、滕縣華北神學院、滬江浸會神學院），其餘七所（廣州協和神科學院、齊魯神學院、華西協和大學宗教學院、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金陵神學院、金陵女子神學院、中華女子神學院）為各宗派合辦。⁵一般說來，多宗派合辦的神學院往往優於某宗派獨辦的神學院，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和金陵神學院之所以在中國新教高等神學教育界脫穎而出，多宗派合力當為因素之一。

從入學程度上看，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和金陵神學院是當時中國僅有的兩所神學研究院。1935年「韋格爾報告」建議把中國的神學院校分為以下三級：（1）神學院（theological college），專收高中畢業生，通常教以四年課程；（2）聖道書院（theological training school），專收初中畢業生，通常教以三年課程；（3）神學研究院（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專收大學畢業生，並教以一至三年課程。⁶燕京大學宗教學院步入神學研究院的行列較早，1920年便已規定入學新生須具有大學肄業兩年以上的水準；⁷1923至1924年神科簡章規定新生在中學畢業後讀四年神學預科；1930至1931年的宗教學院簡章則進一步要求「本

⁴ 金陵神學院在歷史上亦有不同的中英文名稱。從1911年成立之日起稱為聖經學院（Nanking Bible Training School），翌年改名為聖道書院（Nanking School of Theology），1917年又改稱金陵神學（Nanking Theological School），直到1929年其中文名才正式定為金陵神學院。見畢范宇：《金陵神學院史（1911-1961）（暫定稿）》，頁43。

⁵ 韋格爾及視察團編，繆秋笙校：《培養教會工作人員的研究》上編（上海：中華基督教宗教教育促進會，1935），頁64～66。

⁶ 韋格爾及視察團編，繆秋笙校：《培養教會工作人員的研究》下編，頁24～39。

⁷ 中華續行委辦會編，蔡詠春等譯：《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年）》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5），頁930～933。

院正科生，須具大學卒業資格」。⁸ 在中國新教神學教育史上，只招大學畢業生為正科生的神學院，只有燕京一家。

金陵神學院成為神學研究院，幾乎與燕京同時。早年該院設有正、附兩科，分別招收高中和初中程度的學生。1918年起設大學科（即後來的神學士科），為大學畢業生提供三年的神學訓練。1920年，學院再度改組，取消附科，正科（即證書科或後來的道學士科）學制則由三年延長至四年，並曾設文學士科（為大學預科畢業生所設，學程三年）。翌年秋又開設函授科，成為提供各級教育的神學院。1938年，金陵神學院獲美國紐約高等教育局頒予特許狀，從此得授神學士 (B.Th.)、道學士 (B.D.)、宗教教育學士 (B.R.E.)、宗教教育碩士 (M.R.E.) 和神學碩士 (M.Th.) 五種學位，成為當時遠東地區唯一獲此特許狀的神學院。⁹ 然而金陵神學院歷年來雖設有神學士科、文學士科、牧師選修科，但其正科學生仍為攻讀道學士科的中學畢業程度的學生，而代表神學研究院程度的神學士科只佔學院的一部，所以嚴格地說，學院的總體水準仍應為神學院而非神學研究院。

此種入學程度上的差距，實與兩院的定位和專業訴求有關。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主要領導人如司徒雷登 (J. Leighton Stuart)、劉廷芳和趙紫宸等均以美國神學教育體制為藍本，試圖把燕京神學院建成中國首屈一指、且與英美最好的神學院相媲美的神學教育機構。無論是劉廷芳神科主任的就職演辭〈一個大學的宗教學院的任務和標準〉，¹⁰ 還是趙紫宸所撰的〈我對中國高等神學教育的夢想〉，¹¹ 均反映了燕京神學院此種一脈相承的建院理念和抱負。1930至1931年宗教學院簡章聲明：「本院的目的，在養成有豐富宗教經驗，具有歷史眼光、科學態度、熱心謀求中國教會的發展，及中國社會進步之男女青年，為中國基督教思想和生活，建樹穩固的基礎。」金陵神學院的建立則受美國紐約聖經師範學校（或稱聖經研究院）院長懷德博士 (Dr. W.W. White) 訪華的推

⁸ 另參徐以驊：〈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盛衰〉，頁96。

⁹ 畢范宇：《金陵神學院史(1911-1961)（暫定稿）》，頁27～28。

¹⁰ 載於《真理與生命》第8卷第7期（1934年12月），頁330～338。

¹¹ 載於《真理與生命》第8卷第7期（1934年12月），頁343～353。

動，最初的辦學理念是加強中國的聖經教育和研究。其簡章宣稱：「本校專以教授聖經，修養靈性，仿紐約聖經學校之模範，合中國現今之時局，培植有志於聖工者為宗旨。」¹²懷德博士的聖經學校被描述成「性質上合辦、學理上完備、教義上守福音、心志上敬虔、教學上得法、目的上實行」的福音派神學校，¹³與燕京一流神學院的目標和後來金陵神學院本身努力的方向，顯然有相當的差距。

然而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和金陵神學院最大的差異，則在前者為教會大學附屬神學院，後者為獨立神學院，教會大學神學院與獨立神學院遂構成神學教育最主要的兩種類別。¹⁴1920年代中期，福州美國公理會的教士黎天錫，曾建議把當時中國學院式神學教育，分為古典——教義型 (classical-dogmatic type) 和科學——歷史型 (scientific-historical) 兩個子類。照黎氏的說法，古典——教義型神學注重超自然的啟示和聖經；而科學——歷史型則強調宗教經驗和科學、歷史的方法。黎氏認為，大多數聖經學校屬於古典——教義型；獨立神學院則有古典——教義型的明顯傾向；而絕大多數教會大學神學院，則最接近科學——歷史型。¹⁵換言之，由於與日益專業化和世俗化的教會大學關係較密切，一般的大學神學院較為自由，而較疏離的獨立神學院則較為保守。

黎氏此種分類，當然是理想型的，但也有相當的依據。燕京大學宗教學院標榜「教會廣涵主義」，實際辦學時則以學術自由為號召，與教會日益疏離，逐漸成為中國自由派神學的重鎮。現代大學文科教育所倡導之懷疑的眼光、批評的精神以及開放的態度，難免對大學神學產生影響。金陵神學院雖然與鄰近之金陵大學有相當程度的合作，但畢竟沒有大學在教會和神學院之間作為緩衝，故在各方面受到合辦教會更直接的干預和控制，而呈保守的傾向。如1917年新聘的教員需簽署下列宣

¹² 張永訓：〈南京金陵神學始末記〉，頁163。

¹³ 畢范宇：《金陵神學院史(1911-1961)（暫定稿）》，頁5。

¹⁴ 此種區分對金陵神學院來說並不是那麼絕對的，該院一向與金陵大學有較密切的聯繫，特別是1914年美國紐約州當局拒絕了該院（時稱聖道書院）立案的申請，金陵大學還一度受合辦差會的委託，代管該院的所有財產。

¹⁵ 黎天錫：《中國基督教牧師的教育》(Samuel H. Leger, *Education of Christian Ministers in China*) (上海：，1925)，頁41～67。

言：「任一教員從在本校擔任教席之日起便須向董事會提交一份書面聲明，重申其對教義準則或本會宣言的忠誠，並宣佈本人信仰聖經的完整性和歷史真實性。」¹⁶ 1920年代初，由於部分金陵神學院福音派教員離任（當中最關鍵的是南長老會江北教區脫離金陵神學院，轉而支持更為保守之華北神學院），金陵神學院才得以維持其中間派的神學立場，並在1930年代中期以後的專業發展中，顯出其在學術和神學上較為開放的傾向。

二、

作為中國當時實力最為雄厚的神學院，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和金陵神學院固然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大學神學院和獨立神學院的身分又使其在教學手段和學術研究上各具特點。

從神學師資上看，燕京和金陵無疑曾擁有中國所有神學院校中最強盛的陣容。中華基督教教育會曾對1925至1926年度中國十所招收高中畢業程度以上學生的神學院校進行調查，發現該年度此十所院校共有教員九十七名，其中金陵有二十七名，燕京十三名，位居第一和第二，兩院教員總數為十所院校全部教員的41%。擁有高級學位教員的數目，兩院便更佔優勢：燕京擁有四位博士，六位碩士；金陵則有一位博士，八位碩士，兩院擁有博士和碩士頭銜者，分別佔十所院校同類學位擁有者總數的56%和44%。¹⁷

燕京的神學教員雖不及金陵的一半，卻不僅是包括吳雷川、劉廷芳、趙紫宸、陳垣、洪煨蓮、徐寶謙在內的全明星教員隊伍，也是當時中國同類神學院校中最本色化的教員隊伍。燕京的華人神學教員無論在人數上或是在學術聲望上均超過西籍教員，這在當時中國所有的神學院校中是絕無僅有的。相比之下，金陵的神學師資則較低，且以西人為

¹⁶ 第一位作此種宣誓的教員是賈玉銘，他後來於1922年離開金神加盟華北神學院。見畢范宇：《金陵神學院史(1911-1961)（暫定稿）》，頁10。

¹⁷ 葛德基：《1925至1926年基督教在華高等教育》(Earl H. Cressy,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 Study for the Year 1925-26*)（上海：中華基督教教育會，1928），頁118～127。

主。1926至1927年度該院有教授、講師共二十名，其中西人十二名，華人八名，分別佔總數的六成和四成。該年度的十三名教授中，只有四名為華人。¹⁸ 1931年李漢鐸被推選為該院歷史上第一任華人院長，¹⁹ 而燕京從1921年劉廷芳出任神科代理科長以來，神學院的最高負責人便一直由華人擔任。

燕京劉廷芳博士就學於紐約協和神學院及哥倫比亞大學，金陵李漢鐸博士則出身自哲吾大學，他們的出身似乎象徵了兩院的差異。協和神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對燕京確實有相當之影響，燕京早期的神學教員中，受紐約協和神學院與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的除了劉廷芳外，還有洪煊蓮、徐寶謙、誠質怡、簡又文、許地山等人。早年金陵曾聘請尚在美國留學的劉廷芳為神學教授，卻派人勸劉「不選紐約協和神學院的有關課程」，²⁰ 反映了該院董事會部分成員對協和自由派神學的猜疑。不過以教員所受的教育界定兩院的神學和學術取向（尤其在兩院成立後期），則有相當的困難。兩院的師生互有交換，例如燕京的校長司徒雷登便曾是金陵的教授；聖約翰大學神科畢業生蔣翼振，曾於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全盛時期在燕京進修神學，後來先後出任金陵和燕京兩神學院的教授；而金陵最後一任院長誠質怡，舊為燕京大學宗教學院新約教授，他也是金陵神學士科最早期的學生之一。

然而就學生而言，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卻難與金陵抗衡。教員對學生的比例偏高，是在華教會大學神學院的主要特點之一。1925至1926年度金陵神學院各類學生共一百人，但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只有五人，形成2.6名教員對一名學生的局面，²¹ 師生比例嚴重失調。燕京神學生人數不足的問題曾引起不少討論。早期燕京宗教學院標榜不受任何宗派控制，所招收的學生多無較深的教會背景，又非受教會指派，於是有人認為就讀燕京的神學生人數甚少，乃因其神學新派，缺乏教會的支

¹⁸ 畢范宇：《金陵神學院史(1911-1961)（暫定稿）》，頁18。

¹⁹ 實際上1932至1933年上半年李漢鐸在美進修，直到1933年才回國就任院長之職。

²⁰ 畢范宇：《金陵神學院史(1911-1961)（暫定稿）》，頁12。

²¹ 《1925至1926年基督教在華高等教育》，頁121、125。

持。²² 其實宗教學院「思想太新」，固然為燕京與教會關係疏遠的原因之一，但燕京所招正科學生須具有大學畢業程度，而金陵之正科生，則為攻讀道學士科的高中畢業生。總計從1915年開辦至1941年，燕京正科共有七十六名畢業生，²³ 而金陵從1930年開始頒授神學士學位到1950年，具大學畢業程度入學而考獲神學專業學位的畢業生只有六十四名（其中道學士十七名、神學士三十一名、宗教教育碩士十六名），²⁴ 在訓練大學畢業以上程度神學生方面，兩院可說是旗鼓相當。從此可見，標準過高實為燕京招生不足的主要成因。

燕京等教會大學神學院由於標準較高，在學來源上比獨立神學院更受限制，但其畢業生與獨立神學院的相比，則在擔任牧職外有更多的選擇，因此一般說來，教會大學神學院的「有效」畢業生的比例，往往小於獨立神學院。1931年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所有一百一十名畢業生中，明確從事宗教社會服務的只有五十六人，佔畢業生總數的一半左右。²⁵ 據趙紫宸1934年的估計，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六十多名正科畢業生中，擔任牧職的僅佔三分之一；²⁶ 而至1950年金陵歷屆畢業生中，擔任傳道工作的則高達八成。²⁷ 由於合辦差會的壓力和培養教牧的實際需要，從1920年代末期起，燕京也不得不改弦更張，在正科生外增招

²² 如邵玉銘：《一個美國在華宣教士：司徒雷登與中美關係》（Yu-ming Shaw, *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 John Leighton Stuart and 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波士頓：哈佛大學出版社，1992），頁88。關於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師生少的原因，可參徐以驊：〈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盛衰〉，頁111～103。

²³ 《燕京大學宗教學院1946～1947年紀念冊》。

²⁴ 「本院歷年各科畢業生表」，〈金陵神學院開創四十年來之歷史〉，頁9。當然金陵神學院函授科的學生遠遠超過其他科目的學生，僅1941至1946年該科在華西辦理期間，便招收了來自二十五個公會的二百八十名學生。見畢范宇：《金陵神學院史（1911-1961）（暫定稿）》，頁36。

²⁵ 此一百一十名畢業生的職業分類如下：教育，二十一人；國內研究，二人；國外研究，三人；政界，六人；宗教社會服務，五十六人；實業界，三人；已故，一人；未詳，十八人。見《燕京大學畢業同學錄再版》（1931年12月），頁112。

²⁶ 趙紫宸致祁天賜（N. Gist Gee）函，1934年8月8日，《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檔》（*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Archives*），下簡稱《聯董會檔》，縮微膠卷189號，頁523。

²⁷ 〈補白〉，《金陵神學誌》第26卷第1、2期合刊（1950年11月），頁202。

專修生、特別生和短期生。到 1940 年代初，該院的非正科學生無論是在校還是已畢業，均已超過正科生而構成學生的主體。

照金陵神學院教授師當理 (C. Stanley Smith) 的說法，中國基督教神學教育主要是參照英、美兩國的制度。英國大學傳統的神學教育，通常結合大學文科和神科的課程；而美國和蘇格蘭的神學教育的標準則較高，通常要求在完成四年大學學業後再進修三年神學。²⁸ 其實在中國，真正實踐美國神學教育模式（即四年大學加三年神學訓練）的，只有燕京一家。然而此種神學教育的理想模式，確如陽春白雪，高於中國教會的現實。連趙紫宸本人後來也不得不承認，如果要在中國有效開展神學教育，燕京應兼有低於研究院程度的本科程度神學院。²⁹

在學校的財政方面，燕京和金陵的實力對比可謂情況逆轉。早年燕京大學宗教學院便在美積極籌措捐贈基金，由於獲得來自基金的固定收入，該院逐漸成為當時所有只招高中畢業生的神學院中，最「財大氣粗」的一所。1934 至 1935 年度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總收入為 30 080 元，其中學費佔 2 240 元，捐贈基金收入為 27 840 元，收入居中國全部神學院之冠；而同年度收入位居第二的金陵神學院，總收入則為 28 742 元：其中 17 300 元來自差會，學費收入為 1 325 元，其他收入為 10 117 元。³⁰ 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在開辦經費上不再依靠合辦學院之差會，也是導致該院與教會關係疏遠的客觀因素之一。

然而正如美國平信徒調查團報告所指出，中國神學院「印出來的財務報告毫無價值，因為通常均略去宣教士教員的工資或津貼，而這些工資和津貼也許是構成全部開支的較大的一部分」。³¹ 由於外國教員的薪金一般均由差會提供，而中國教員的薪金則需自籌，因此燕大宗教學

²⁸ 師當理：《中國基督教神學教育的發展》，頁 42～43、56～57、123～124。

²⁹ 趙紫宸致甘博 (Sidney D. Gamble) 函，1947 年 6 月，《聯董會檔》縮微膠卷 164，頁 534。

³⁰ 韋格爾及視察團編，繆秋筌校：《培養教會工作人員的研究》，第四章。

³¹ 費希爾、道格拉斯：〈教會與其領袖〉(Stanley Ross Fisher and H. Paul Douglass, "The Church and Its Leadership")，載美國平信徒調查團編：《宣教事業評議》分報告第 5 卷 (Laymen's Foreign Missions Inquiry, Vol. 5: Supplementary Series)，頁 274。

院傑出的中國教員團體雖然在學術研究上是學院的巨大財富，但在財政上卻是學院的沉重負擔。儘管燕大宗教學院的帳面收入比其他神學院高，但因其中國教員人數佔優，支出也就最大，常常入不敷出，收支難以平衡。1929至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出現經濟危機，宗教學院海外基金收入銳減，財政上更加捉襟見肘。在經費緊縮的壓力下，學院不得不靠減少獎學金和裁減教員來維持，結果導致學院「夢幻組合」式的教員團體在1930年代中期離散飄零，中國新教神學教育的「燕京時代」，在宗教學院本身瀕臨解體的認同和生存危機之際，被劃上句號。

金陵神學院的經費主要來自合辦差會，故無論在神學還是在學術上，一向沒有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那種自由度。1930年代初，金陵神學院得到美國溫得爾——斯沃普 (Wendel-Swope) 家族高達二百五十萬美元的巨額遺產，從此該院的取向乃至中國新教神學的整個格局均大大改變。³² 1935年由金陵神學院資助的韋格爾視察團在其報告中，建議加強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和金陵神學院這兩所中國當時僅有的神學研究院的力量，其中燕京仍以學術研究和培養基督教學者為主；而金陵則強調實際教牧事工以造就教會領袖；這可說是承認了中國新教神學教育領域燕京金陵「雙峰對峙」的局面。³³ 「韋格爾報告」雖然主張燕京和金陵分工合作，互為補充，但實際上金陵已在發展其龐大的教學和研究計劃，並著手重整全國的神學教育。193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新教神學教育領域大部分重大的跨院校活動，均由金陵神學院倡導或資助。還在1935年，燕大校長司徒雷登便不得不承認，由於金陵獲得溫氏的遺產，「今後在任何金錢能起作用的地方，金陵集團將佔盡優勢」。³⁴

在學術取向方面，一般公認燕京重學術、金陵重職業訓練；燕京創造性的學術研究和金陵的宗教教育及鄉村教會事工，似乎便為兩院的主要特色。然而這種簡單的區分並不能涵蓋兩院的全部歷史。燕京大學宗

³² 1934年，金神得到第一筆來自溫氏遺產的收入5000美元。見畢范宇：《金陵神學院史(1911-1961)》(暫定稿)，頁20。

³³ 韋格爾及視察團編，繆秋笙校：《培養教會工作人員的研究》下編，頁49～50。

³⁴ 司徒雷登致葛思德 (B.A. Garside) 函，1935年8月14日，《聯董會檔》縮微膠卷189，頁1189。

教學院早期也以教牧職業訓練為主，後來才逐步過渡到職業訓練和學術研究並重，再而偏重學術研究；金陵神學院固然以職業訓練為本，但後來也努力發展學術，呈現「燕京化」的趨勢。尤其在獲得溫氏遺產後，金陵的學術建設蒸蒸日上，燕京神學卻隨師資的離散而江河日下，兩所學院在學術上的差距大為縮小。

在學校出版物上，燕京與金陵亦難分軒輊。中國新教神學最權威的兩份期刊《真理與生命》和《金陵神學誌》，便分別為兩院所辦。《真理與生命》脫胎於「北京證道團」1919年10月所創辦之《生命》季刊，它雖然不是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機關刊物，但其編輯和主要撰稿人，均出自燕京。1924年該刊編輯部又遷入燕京，完全「燕京化」。《金陵神學誌》創刊於1914年2月，首任主筆為金陵神學院第一位華人教員陳金鏞。與《真理與生命》一樣，該刊的編輯多年來主要由華人擔任。³⁵此外，燕京還出版全國性的刊物《紫晶》，金陵則辦《鄉村教會》。中國新教神學文字陣地最先由華人佔領，也是中國神學教育的一大特點。一般而言，《真理與生命》以撰述居多，而《金陵神學誌》則以譯作見長，這也是兩院文字事工的基本特色。燕京曾出版《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吳雷川）、《墨翟與耶穌》（吳雷川）、《基督教進解》（趙紫宸）和《聖保羅傳》（趙紫宸）等十來種學術著作，在獨創性的神學研究上略勝一籌；而金陵在鄉村教會建設以及後來大規模譯介西方神學名著方面，對推進中國新教教會的組織、思想建設和文字事工亦有重大貢獻。

兩所神學在學術取向上的差異，當然跟它們與大學的關係有關。燕京的趙紫宸曾經典性地評價說，獨立神學院有其長處，即「能專心而虔誠」；有其短處，即在「卑陝而僵幹」，因此主張神學院「最好與鄰近的大學發生關係，使其學生得在大學各系讀相當的課程」³⁶。然而大學神學卻顧此失彼，獨立神學院的長處往往正是大學神學院的短處，趙紫宸所擔憂的「世俗變移聖善」，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神學與大學聯合應有

³⁵ 繼陳金鏞後擔任該刊主編的先後有朱顯文、程修茲、朱寶惠、董小圓、王治心、陳維屏、萬國同、李路德、施焯方、鄒秉彝、程伯群、誠質怡、謝受靈、余牧人等。

³⁶ 趙紫宸：《我對中國高等神學教育的夢想》，頁347。

的結果。其實在專業化和多元化潮流的衝擊下，神學院在大學的位置，已逐漸從中心退至邊緣，大學與神學日益分離，神學變成大學文科中的一科，似是大勢所趨。燕京大學宗教學院試圖藉較廣泛的宗教研究以補充或取代較狹窄的神學研究，並以模糊或稀釋本身獨特性的方式應付此種「邊緣化」的處境，這不僅使其課程人文化，還使其教員分散在各系，結果雖然擴大了影響範圍，但也「在大學的各種活動中分散了精力」。³⁷

三、

到1930年代中期，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和金陵神學院各自的發展趨勢和相互的實力對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燕京，昔日體現勃勃雄心的發展藍圖，已為權宜對策所取代，為的是掙扎圖存；在金陵，巨大的贈款帶來相應的發展條件和機會。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和金陵神學院實力的此消彼長，固然有諸多的偶然因素，卻也是大學和獨立這兩類神學院發展的必然結果。

就偶然因素而言，神學院校不能按政府法令在中國註冊立案，是中國基督教神學教育所面臨的特殊處境。作為教會大學最顯著標誌的神學院由於不能立案，在法律上便處於被政府否認的地位，即使其在地理上仍可被視為學校的一部分。於是在立案風潮中，所有教會大學均依據政府法規，在形式上或在實質上與神學院分離。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雖保持原名，但在校章上已非大學之一部。只有拒絕立案的聖約翰大學，其神學院才得以維持現狀，不過大學本身的存在卻現危機。³⁸ 總的說來，1920年代保留神學院（或神科）的大學還有六所，到1930年代中只剩下四所（燕京大學宗教學院、聖約翰大學神學院、齊魯神學院和華西協和大學宗教學院）。至少就數量而言，教會大學神學院這些年來是有減無增的。

³⁷ 趙紫宸致司徒雷登函，1931年1月30日，《聯董會檔》縮微膠卷164，頁431。

³⁸ 關於聖約翰大學神學院的資料，可參徐以驊：《教育與宗教：作為傳教媒介的聖約翰大學》（廣東：珠海出版社，1999），頁248～299。

其次，金陵神學院1930年代初獲得溫氏的巨額遺產，完全出乎該院、乃至整個素來貧血的中國新教神學教育界所預料。1935年5月22日，金陵神學院通過《金陵神學院計劃書》，在大力擴充學生、師資、設施和研究計劃的同時，呼籲其他神學院合作，以分享其控制的部分資金。同年7月，中華基督教宗教教育促進會在牯陵召開年會。這次中國基督教神學教育界有史以來最大的會議，決定成立中華基督教神學聯合會，以協調全國神學教育的發展，並支持金陵神學院出面聯合廣州協和神學院、華西協和大學宗教學院、齊魯神學院，由四院共用「金陵神學院」名義，在同一院董會領導下，分別於南京、廣州、成都、濟南四處協理神學院。³⁹ 1936年1月金陵董事會邀請其他三院董事會參加四院聯席會議，成立臨時委員會商討具體聯合事宜。⁴⁰ 儘管這龐大的「神學組合計劃」因抗戰爆發等因素而終未實現，但金陵神學院在神學教育界的領袖地位卻因此而確立。

再者，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是另一個意想不到的因素。由於不屬於政府教育體制而又建於沿海地區，各級神學院校在整個抗戰期間的損失，比教會及其他教育機構更為嚴重。⁴¹ 相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日軍關閉的燕京大學和其他神學院校而言，金陵神學院由於較早轉移至上海和成都設立分部，損失較輕，尤其是與華西協和神學院密切合作的華西分部神學士科，在整個抗戰期間一直開辦，成為當時大學畢業入學程度的神學生的主要來源。抗戰後期較有聲色的神學教育和學術活動，如鄉村和城市教會建設、內地神學教育推廣計劃、神學教育調查與研究、基督教經典文獻編譯以及學術演講與交流，幾乎均與金陵神學院的華西分部有關。

³⁹ 韋格爾視察團編，廖秋笙校：《培養教會工作人員的研究》下編，頁42；附錄第三章：〈金陵神學院計劃書〉，頁9～14。

⁴⁰ 畢范宇：《金陵神學院史(1911-1961)（暫定稿）》，頁22。

⁴¹ 抗戰期間中國基督教的神學教育情況，可參師當理：〈中國的神學教育〉C. Stanley Smith,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China", 《國際宣教評論》(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第34卷(1945年)，頁377～388；師當理：《1933～1934年度至1943～1944年度十年間中國的神學教育》(C. Stanley Smith,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Decade 1933-34 to 1943-44")，(紐約：金陵神學院托事部，1944)，頁158～165。

然而，大學神學的式微，也有其必然的原因。從理論上說，大學神學院（或宗教學院）在完成職業訓練與學術研究雙重使命或目標方面，經常得二擇其一。現代大學創造出一種專業文化，使所屬的各院系只有通過專業化的學術研究和教學實踐，才能在大學中佔有一席之地。然而大學神學院既在專業上被要求服從大學的遊戲規則，又在信仰上被要求服從教會的傳統教義。這樣，大學神學院肩負著所謂雙重服從之軛；大學和教會的要求，產生巨大的張力。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在其全盛時期，重學術而輕職業訓練，近大學而遠教會，以大學而非教會的標準為依歸，結果雖然獲得學理上的自由和聲譽，卻失去教會的支持和教會意識。只是在瀕臨解體的情況下，學院才開始「回歸」教會，後來甚至紆尊降貴，要與教會「相依為命」。學院與大學和教會的關係，又發生戲劇性的調整。

在實踐上，大學神學院的萎頓乃至危機均是普世現象，儘管出現的時間有先有後。以美國為例，長期以來大學神學院（或宗教學院）在美國的神學教育界，一直佔有支配地位，負有向其他神學院校提供標準和師資的使命。然而在專業化和多元化等現代大學發展趨勢的影響下，美國大學神學院在結合大學和教會目標、履行專業學術研究和培養教牧人才的雙重使命上，遇到愈來愈大的阻力。尤其是從 1960 年代以來，美國大學神學院面臨來自兩方面的愈來愈大的挑戰：一方面，美國大專院校迅速擴張的宗教系和宗教研究計劃，已經在學術研究和資源上與大學神學院形成互相競爭的局面；另一方面，獨立神學院不僅在提供教牧職業訓練上擁有比大學神學院更多的優勢，而且在學術研究上正在成為足以與大學神學院分庭抗禮的中心。面對雙重挑戰，大學神學院不僅在神學教育界失去往日的優勢，在其所在大學中的地位也日趨邊緣化而陷於嚴重的認同危機。⁴² 某一專業學科的功能一旦不再特殊而可被其他科所替代，便隨時有自行消亡的可能。

⁴² 關於美國的基督教神學教育以及大學神學院與獨立神學院之比較，可參北川約瑟編：《宗教研究、神學研究和大學神學院》（Joseph Mitsuo Kitagawa, ed., *Religious Studies, Theological Studies and the University-Divinity Schools*）（亞特蘭大：1992）；徹里：《急赴錫安：大學、大學神學院與美國新教》（Conrad Cherry, *Hurrying Toward Zion: Universities, Divinity Schools, and American Protestantism*）（布盧明頓：印地安那大學出版社，1995）；法利：

由於種種偶然的因素，大學神學院在中國的自然發展進程一再被打斷。然而大學神學院在新教神學教育界由強轉弱的軌跡，卻仍清晰可見。在本世紀首二十年，近半數的教會大學設有神學院。這些大學神學院在學術水準、師資配置甚至在學生數量上，均優於同類的獨立神學院。其中同屬美國聖公會的聖約翰大學神科和文華大學神科，由於起點高且用英語教學，曾經風光一時。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後來居上，成為中國新教第一所神學研究院，在學術研究上一枝獨秀，為他院難以企及。然而，隨著時間推移，教會大學在神學教育上的領先地位，受到來自獨立神學院的挑戰。1920年代末，有中國新教基要派神學大本營之稱的華北神學院異軍突起，該院收生來源充足，盡顯保守神學人數上的優勢。1930年代中蓄勢待發的金陵神學院後來居上，終於坐上新教神學教育的頭把交椅。如果不是由於日軍入侵華北而導致華北神學院南遷，193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新教神學教育原可出現燕京、金陵、華北三足鼎立的局面，此三所神學院正好分別代表中國基督教左、中、右三派勢力。趙紫宸稱其時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和金陵神學院在高等神學教育界仍旗鼓相當、「雙峰對峙」，其實前者只擁有一些往日的榮耀，總體實力根本無法與後者抗衡。因此金陵神學院在1930年代中期的崛起，不僅標誌著中國基督教神學教育燕京時代的結束和金陵時代的來臨，同時也表明高等神學教育的重心已全面地從教會大學神學院向獨立神學院傾斜。⁴³

對於大學神學院和獨立神學院各自的長處和短處，燕京的趙紫宸有深刻體驗，並曾設想出揚長避短的「貌離神合」解決方案，可謂用心良苦。照趙氏的設想，理想的神學院應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1）此種神學院應是半修道院式的，立志不婚嫁的可終身居院，已婚嫁者則可擇時入院修養，男女均可放下俗務，過修道士式的生活，以「科學的方法，宗教的精神」從事修習，從此則「宗教生活可以助學問，而學問亦

《知識的脆弱：教會和大學的神學教育》(Edward Farley, *The Fragility of Knowledge: The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e Church and the University*) (費城：1988)；馬斯登：《美國大學的靈魂：從新教的中心到無信仰的地盤》(George M. Marsden, *The Soul of American University: From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to Established Nonbelief*) (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⁴³ 可參徐以驊：《教會大學與神學教育》，頁19～67。

可助宗教」；⁴⁴（2）此種神學院應設在大學校園之外，但又與大學保持「不遠不近、若即若離」的關係：近至可讓學院享用大學所提供的資源，並且為大學提供有效的宗教服務；遠至可保持學院的個性和師生同處的團契生活。這樣，「在精神上而非在形式上院校仍為一體」；⁴⁵（3）此種神學院應是多功能的宗教中心：它既是神學院，又是研究中心；既是函授學院，又是宗教實驗站，同時也是舉行退修會和其他各種會議的會議中心。趙氏認為此種宗教中心一旦形成，學院便得以「本色的接觸方式」與中國社會發生關係，從而使本色神學能從中心向華北乃至全國輻射。⁴⁶然而趙紫宸此種本色化的建院理想，儘管曾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於燕京引起激烈討論，終因缺乏大權在握的合辦差會的支持而胎死腹中，⁴⁷於是在關於大學和獨立神學院優劣的世界性辯論中，中國教會失去了一次有創造性貢獻的機會。

1949年，中國基督教神學的自然發展再次中斷。1951年2月燕京大學宗教學院改名燕京宗教學院，與大學正式脫離關係。1953年，該院先後與北京神學院、聯合女子聖道神學院、中華聖潔教會聖經神學院、中華基督教會東北神學院、華內浸會神學院、中國基督教信義會信義神學院合併，成立燕京協和神學院；金陵神學院則於1952年與上海聖公會中央神學院、上海浸會神學院、杭州中國神學院、無錫華北神學院、濟南齊魯神學院、漳州閩南神學院、福州協和神學院、寧波三一神學院、鎮江浸會聖經學院、濟南明道聖經學院聯合，成立金陵協和神學院。⁴⁸1953年後，大陸整個基督教會只有燕京和金陵兩所協和神學院，

⁴⁴ 趙紫宸：〈我對中華基督教文字問題的感想〉，《文社月刊》第1卷第1期（1925年），頁21～28。

⁴⁵ 趙紫宸致全紹文函，1930年4月23日，《聯董會檔》縮微膠卷164，頁415。

⁴⁶ 趙紫宸：〈關於宗教學院的備忘錄〉（Memorandum Regarding the School of Religion），1932年，《聯董會檔》縮微膠卷159，頁508。

⁴⁷ 趙紫宸的建院思想和燕京院校分離的風波，可參徐以驊：〈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盛衰〉，頁112～119。

⁴⁸ 兩院合併的情形，可參中國基督教全國會議秘書處編印：《金陵協和神學院、燕京協和神學院介紹》（1954年8月）；〈金陵神學院介紹〉（1955年10月修正），載《金陵神學誌》第4期（1955年11月），頁63～66。

依稀可見當年「雙峰對峙」的影子。1961年燕京協和神學院被併入金陵協和神學院，基督教神學教育終於九九歸一，形成金陵大一統的局面。大學和獨立神學院的優劣之爭，只具理論上的意義。⁴⁹

撮 要

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和金陵神學院是1949年前中國新教教會最重要的神學教育機構，其中一所為大學神學院，一所為獨立神學院，兩所神學互爭雄長，各領風騷，掌攬著中國新教高等教育發展的大勢。本文通過對此兩所神學的比較，試圖勾勒中國新教高等神學教育發展的基本面貌，並且指出中國新教神學教育的重心發生從大學神學院到獨立神學院的遷移，乃是此兩類神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ABSTRACT

The Yench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Religion and Nanking Gheological Seminary were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stitutions of Protestant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China before 1949. These two schools, one university affiliated and the other free-standing, competed with each other for leadership, and both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based 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se two schools, tries to giv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main features of Protestant theological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shift of the center of gravity from th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s to independent theological seminaries was an inevitable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kinds of theological schools.

⁴⁹ 唯一的例外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系神學組，該神學組是目前中國（包括台灣地區在內）僅有的大學神學院。